

理學思想與文獻專輯前言

鍾彩鈞*

宋明理學研究在前輩學者的開拓下，建立了幾種解釋模式。從北宋至明末，歷史上大體依次出現了天道論、理氣論、心性論，但這只是非常粗略的區分，其實有犬牙交錯的狀況，甚至可做不同的歸類。如果在歷史發生之上再加上理論演繹，又可產生不同的分類，例如在臺、港，牟宗三先生提出三系說，勞思光先生提出一系三階段說，大陸學界流行的則是理本論、心本論、氣本論三系之說。其他還有一些新的解釋模式的嘗試，以其尚未普遍，姑不列舉。新的解釋模式所以可能，除了當代思想的發展提供了新的詮釋理論外，還有一個重要原因，就是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、《續修四庫全書》等大型叢書的編印，使得從前難得一見的理學文獻，特別是明代思想相關文獻，如今可以輕易上手，遂使明代理學研究的新著紛紛出現。雖然這些研究須由積累而至成熟，但量變會產生質變，使得新的解釋模式的提出成為可以期待之事。

思想研究是建立在文獻之上的，新文獻的運用可以獲致新的研究成果，但新文獻不一定要在不見天日的廢紙堆中找，也可能在刊刻的成書中不期而遇。然而舊本的重見與復原，固然增加了文獻資料，是否可能又帶來新的研究阻礙呢？對於文獻應該有的合理態度，是不論新出現的或原來習見的，都要謹慎地去檢查與批判，不可輕信，亦不可隨便廢棄。

張學智〈江右王門王塘南的哲學思想〉一文以為塘南之學「形上之識度特精，各個概念之間的分析與融攝有較高的程度，因而整個理論在論證、體悟的深度和含攝面的廣度方面都超過了江右餘子」。張教授的重點是王塘南的學術成就，但筆者讀過之後，也有新的體會，就是王塘南除了王門相傳的體驗之學外，在綜合與思辨

* 鍾彩鈞，本所研究員。

上一定程度地總結了江右，也暗示了將進入新的時代。此文雖是純粹的哲學論文，但也是運用新資料做研究的一個例子。其徵引的《友慶堂合稿》、《恭憶先訓自考錄》以前皆是難得之書，而後者尤其珍貴。鍾彩鈞〈黃宗羲《明儒學案》的異本問題〉一文，對清末以來流行百年的莫晉刊本，與近年大陸出版點校本所依據的鄭性刊本的內容作考證，指出莫本內容因有刪節，在資料價值上不如鄭本，然而亦有多出於鄭本之處，以後點校本再版時，宜吸收莫本的長處。從黃宗羲《明儒學案》可聯想到他另一本篇幅甚小而影響極大的書——《明夷待訪錄》。孫寶山〈胡適批點的《明夷待訪錄》〉一文，從胡適在《明夷待訪錄》上的寥寥幾句批語，補正胡適日記上缺載的活動，考察《明夷待訪錄》對當時政治思想的影響。此文說明了文獻學的對象不僅是文獻的創作與流傳，還可考察對於後世的影響。

版本重製時每每失真，同時造成前一版本的失傳，對於研究是不利的，因此版本間的相互比較，求真求善，實為文獻學的主要課題。嚴佐之〈版本再造的「得而復失」與「失而復得」——以《中庸集解》、《中庸輯略》為例〉，便以南宋石荅《中庸集解》、朱熹《中庸輯略》的流傳、失傳與再造來說明。二書的復得與正確使用，對於理學思想的研究有積極幫助，是毫無疑問的。但筆者讀此文而又有所感。《中庸集解》的復原，是清人莫友芝從南宋衛湜《禮記集說》中輯刻，名為《十先生中庸集解》，書中對輯文、序跋、附錄等都作了詳細的校注，是一部學術價值很高的書。筆者所歎，在衛湜《禮記集說》並非僻書，卻直到莫友芝才發現其中藏有《中庸集解》原本的「祕密」，而莫友芝為著名的目錄版本學家，有這樣重要的著作，卻極少見到理學研究者的利用與稱引。原來至寶早在收藏之中，未必要上山下海去採掘啊！

理學研究在前輩大師提出典範之後，要繼續地進步與突破，有賴於新資料的運用，而資料不論新舊，在運用時都有批評考證的必要。今天明代學術資料大出，不但思想研究者受惠，也為文獻學者提供了新天地。筆者建議雙方皆須具備對方的基本學識，以期能夠使用雙方既有的研究成果，並促成進一步的交流與合作。以上四篇論文的刊登，或許能為這個想法鋪路。至於四篇的次序，則依論題的時代先後來排列。